

构建“人类对话中的哲学”

蓝克林

对于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而言，理查·伯恩斯坦远不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那样声名远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著作和思想较少受到关注，他的几部重要代表作，如《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根本恶》等，也都是进入本世纪才陆续推出中文译本。

与他的大学校友和终身的哲学同行理查·罗蒂相比，今年7月4日辞世的伯恩斯坦也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位美国哲学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译本甫一出版，学术界就争说罗蒂和后现代哲学，成就一时的盛景。的确，罗蒂以当代西方哲学“弑父者”姿态，凭借“自然之镜”的生动隐喻，扳倒了他眼里已经统治了西方哲学两千年的“表象论”传统。就此而言，在当时后现代话语被大加追捧的氛围中，罗蒂无疑有了重要份量。

细究起来，罗蒂在解构西方哲学两千年“表象论”传统的同时，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谱系，海德格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杜威是其新哲学谱系中的三位“超级英雄”。在这一学术理路上，伯恩斯坦与罗蒂可以说有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两位“理查”接受大学教育及研究起步之际，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上风之时，他们都对分析哲学的独霸一方抱持天然的反感。两位“理查”都对欧陆哲学保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并且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对话和研究。更为重

要的是，两位“理查”都是“接着讲”的学界高手，融合了欧陆哲学的思想资源，对杜威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不遗余力加以重新阐发，别开生面形成新实用主义的学说。两位“理查”都在各自的晚年对美国政治的衰败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罗蒂在他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曾预言，随着原有局面的崩溃，底层的美国人会选择一位非主流的政治强人上位，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后来的特朗普执政差不多就是对罗蒂这一预言的佐证；而伯恩斯坦在晚年的多次访谈中，也都对美国政治的溃败表达过深深的忧虑。

在伯恩斯坦教授的思想版图中，“engaged pluralism”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这是他用来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有力工具，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通过对确定性的寻求来达致绝对性，以总体性的观念消弭了差异性——他用“笛卡尔式忧虑”一词来指陈这一传统。“engaged pluralism”较早是在他的论文《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其主旨是：在多元论中，多元论者不应追求一种统一的、确定的、最终的、不可辩驳的真理，而应接受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持续的对话。这一思想在十年后的2002年6月，他来上海参加学术活动，蒙童世骏教授相约，得以在金陵大厦见面。我带上了《新星座》一书，他在扉页上补签了两行字：“最美好的祝愿，十年以后，理查·伯恩斯坦”。我曾当面向他请教“engaged pluralism”的译法，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未做记录，他本人的解说已经无法完整还原。迄今，对此概念有过“有立场的多元论”“有限制的多元论”“参与的多元论”等多种译法；译法不同，其所蕴涵的洞见则是确定的，它深刻提示我们：不受限制的多元论是盲目、散漫的，拘于一隅的独断论则是封闭、褊狭的。诚如他本人所言，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或哪一种哲学风格能够垄断哲学的全部洞

见，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鲜明分野，哲学只有好坏之分，而所谓好的哲学，正像他本人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就是“人类对话中的哲学”。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通过不断的交往和对话来延展，其中就特别包含了持久的学术交往和思想友谊。事实上，一个学者的思想成长，促成因素除了他/她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他/她所遇见过的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伯恩斯坦同当代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有过比较切近的学术对话和交往，他的《形而上学评论》杂志主编和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之类的身份，也推动了他的各类学术交往。进入本世纪以来，他也和中国的同行们开展了越来越密切的学术交流，继2002年的上海之行后，他又曾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来过上海参与和开展多场学术交流，并寄望中国创造性地借鉴西方，而不要不加选择地模仿西方，维护好自己特有的东西。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与“不可通约性”展开辩证。“不可通约性”原本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泛指因不同“范式”所导致的鸡同鸭讲的知识困境。伯恩斯坦教授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反复把“不可通约性”作为他倡导的“人类对话中的哲学”所要消解的目标，在他看来，解释学哲学在承认

见，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鲜明分野，哲学只有好坏之分，而所谓好的哲学，正像他本人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就是“人类对话中的哲学”。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通过不断的交往和对话来延展，其中就特别包含了持久的学术交往和思想友谊。事实上，一个学者的思想成长，促成因素除了他/她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他/她所遇见过的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伯恩斯坦同当代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有过比较切近的学术对话和交往，他的《形而上学评论》杂志主编和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之类的身份，也推动了他的各类学术交往。进入本世纪以来，他也和中国的同行们开展了越来越密切的学术交流，继2002年的上海之行后，他又曾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来过上海参与和开展多场学术交流，并寄望中国创造性地借鉴西方，而不要不加选择地模仿西方，维护好自己特有的东西。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与“不可通约性”展开辩证。“不可通约性”原本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泛指因不同“范式”所导致的鸡同鸭讲的知识困境。伯恩斯坦教授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反复把“不可通约性”作为他倡导的“人类对话中的哲学”所要消解的目标，在他看来，解释学哲学在承认



理查·伯恩斯坦 (Richard J. Bernstein, 1932—2022) 195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一直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哲学系任教。

“先见”前提下通过对话达成“视界融合”，以及实用主义哲学所认可的科学探究的“可错论”，正是助推人类走出“不可通约”困境的良药。从广义意义上讲，哲学理应承担为人类的理性做辩护、为人类的实践做导向的职责，一种“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持续的对话，借助不同视界的互动融合，来破解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不可通约”。在全球诸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当下，偏见可能会助长分歧，分歧或许会加深分歧，当此之际，进一步加深对话和交往，真正推动人类理性的共同成长，显得弥足珍贵。

邓伟志

元宇宙的社会学之间

元宇宙开辟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呼应的、增加时空超越感的、比现实世界更神奇的虚拟世界。由孔德开创的社会学对现实世界作了长达二百年的社会学探索，那么虚拟世界出现之后，会对社会学提出哪些新问题呢？

社会学从齐美尔1908年所著的《社会学》一书开始，一直在讨论“互动论”。有学者（帕克和布鲁默）在研究角色理论时，提出“角色互动”，强调“自我”。元宇宙是靠“人机互动”而来，那么“自我”的作用会不会被弱化？超人的虚拟世界完全是由人操控的，居于现实世界中的人肯定还是主体，不过，会不会是暂时相对弱化的主体呢？

社会学中有社会交换论，研究的范畴包括价值、投资、代价、公平和最优原则。元宇宙去中心化，有助于公平和社会结构扁平化。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所占有的资源有多寡，操作元宇宙的投入必然有高低，加之在元宇宙中可能出现的“数字垄断”“数字鸿沟”，各主体的话语权有大有小，会不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从而影响现实社会的平衡？这些有利、不利因素，孰大孰小，有待研究。如何解构，也有待研究。

社会学讲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出现元宇宙之后会怎样呢？虚拟世界虽名曰虚拟，其实大大有助于丰富实践——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反观现实世界，更加清晰地分析和综合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那么，随着元宇宙的兴起和推广，会不会进一步验证并丰富社会学方法论？中国社会学界在前人的“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如今出现了新事物，毫无疑问会对旧有概念发起挑战。在当代人里，会不会有人观念滞后，阻碍元宇宙前进？与此同时，会不会有人故意扭曲，利用元宇宙作恶？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随着元宇宙的出现而不断改进，提升元宇宙道德，完善元宇宙法制。

社会学注重社会变迁的研究。虚拟世界延长、拓宽了现实世界，必然会引发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会是怎样的分化和组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社会制度变革。元宇宙是技术汇聚，是第一生产力的领头羊，那么社会制度应该如何做出相应的变革呢？凡事预则立。对此要施展前瞻性的思维，否则会在虚拟世界面前手忙脚乱，陷于被动。

新事物必然会带来新问题。元宇宙将给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带来一系列值得研讨的新课题，广大理论工作者也应该昂首迎接新事物的挑战。

揭开詹糖香的神秘面纱

复之

今年5月，研究人员对陕西法门寺地宫宝函中供奉的香料进行了分析，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论文，确定了其中的三种香料分别是沉香、乳香和榄香脂。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合香实物(沉乳合香)与古代榄香脂实物。

沉香是瑞香科沉香属一些物种的含脂木材，乳香则是橄榄科乳香属一些物种分泌的树脂，二者都是佛教中的常用香料，如今的一些高级供奉线香中仍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而关于榄香脂，论文中的表述是：“……唐代古籍中未见有关‘榄香’的明确记载。最接近的可能是地理著作《岭表录异》中所记……这些古代文献中记录的榄糖糖的用法(补船)表明，它不太可能用于皇家的供奉仪式，因而法门寺地宫保存完好的榄香很可能是进口而来。”又，“文献中没有榄香的记载，暗示这一时期中国对榄香脂的使用较少”。

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何代表唐朝最高规格的供奉香料中会出现一种没有记载的香料？

实际上，唐代文献没有“榄香”的记载，并非因为其使用不广泛，而恰恰相反，它是文献常有提及，但之后失传已久的“詹糖香”。

早在1963年，著名汉学家薛爱华在《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中译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1995)中即指出，詹糖香与榄糖糖俱为榄香，但出自两种橄榄树，且一作香料用，一作补船用。他写道：

“trām”(詹)是安南语“kanari”(即橄榄属树)的读音。詹糖香实际上就是能够产出树脂的橄榄的树脂。唐代时在岭南的某些地区——很可能是在靠近安南边界附近的地区——就生长着这种詹糖树。但是当时的北部湾是詹糖香的最主要的产地。它是一种有柠檬和松节油香味的，略呈白色的颗粒状物质，但是由于混合了炭，所以用它制成的詹糖香通常都是黑色的。苏恭说：“詹糖树似橘，煎枝叶为香，似沙糖而黑，出交、广以南。”詹糖香在长安的使用，必定也和北部湾一样，是用来在神坛上焚烧的。

薛爱华在此还参考了法国植物学家克雷沃斯特《Catalogue des produits de l'Indochine》(1925)中的内容。

安南人称橄榄为 trām-tràng(白橄榄)，可能就是中文“詹糖、占唐、詹糖”的由来。他们收集詹糖香之后，在其中掺入木炭粉，然后裹到竹签上，做成筒筒的竹签香，作为祭祀拜佛的熏香使用。

詹糖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它最早出现于南朝范缜的《和香方》自序：“癖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霍虚燥，詹唐黏湿。”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更多詹糖香的信息：“皆合香家要用，



陕西法门寺塔基底下，有一座专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建造的地宫。法门寺地宫自唐僖宗敕命封门，过了一千多年，方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1987年，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唐代塔基、石室地宫建筑，以及佛指骨舍利和大量供奉用的华美器物。这套八重宝函(上图)出土于地宫后室，是法门寺文物中最精美、等级最高的一套舍利容器(第八重为檀香木制，发掘时已朽坏)。本文讨论的香料样品(左图)出于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盖顶银宝函。图片来源 法门寺博物馆

不正复入药……詹糖出晋安岭州。上真淳泽者难得，多以其皮及柘虫屎杂之，唯轻者为佳，其余无甚真伪，而有精粗尔。”

结合《和香方》中詹糖的描述，可以确定詹糖是一种粘稠的树脂。之后《梁书》中出现了盘盘国进贡詹糖香的记载：“盘盘国……中大通元五年五月，累遣使贡牙象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盘盘国是3—7世纪时马来半岛东岸的一个小国，其地理位置在暹罗湾附近。它进贡了佛舍利、菩提叶和詹糖香，可见詹糖香在当时是供奉佛祖的重要宝物。

唐人对詹糖香更不陌生，前引苏恭《新修本草》是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詹糖树像橘树，詹糖香的来源是煎煮过的枝叶，成品形态像黑沙糖，并且明确产地在交、广以南，交即交州，包含今越南北部。再看唐人刘向在《岭表录异》中所记补船的榄糖糖，极为相似：“不用铁钉，只使桃榔须系缚，以榄糖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汤，谓之榄糖糖。用泥船，干后坚于胶漆，中水益干耳。”所以薛爱华说：“在着水世纪时，中国人对于榄糖糖热带植物所产出的多种含油树脂都是很熟悉的。”

榄香脂是橄榄科橄榄属多种植物树脂的统称，其中代表物种就是华南地区常见的水果橄榄 *Canarium album*。中原人知道橄榄这种植物，大概可以追溯到汉代，此后榄糖糖长期作为一种异果进贡给皇帝。“榄糖”一词可能来自侗台语系的百越人。橄榄科又被称作香脂科，乳香、没药、秘鲁圣木、柯巴脂等树脂类香料都来源于该科，作为橄榄科代表的橄榄属物种自然也能产生树脂，人们称之为榄糖香(*elemi*)，它的香气非常清新，是带有木质感的柑橘柠檬味，品质好的气味非常像雪碧。

榄糖糖在不同产地的形态不尽相同。广东福建一带的榄糖糖容易干燥固化，香气减弱；海南越南等地的榄糖糖呈粘稠状，香气更浓。如今更常见的榄糖糖产自菲律宾的吕宋榄糖 *Canarium luzonicum*，是国际上榄糖糖的主要来源。物美价廉的榄糖糖精油已是洗护产品中不可或缺的香精原料。

除此之外，印度、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地都有自己地方特色的榄糖糖出产。不管哪个品种的榄糖糖，它们的缺点都是不耐高温，由于其中富含的柠檬烯等单萜挥发油特性，榄糖糖在高温中只剩下淡雅的木质底味。

宋人范成大曾在《桂海虞衡志》里记载了榄糖糖：“榄糖香。榄糖木脂也，状如黑胶。江东人取黄连木及枫木脂以为榄糖。盖其类出于橄

榄，故独有清烈出尘之意，品格在黄连、枫香之上。”《说郛》引《坦斋笔衡》的说法：“两广惟产榄糖糖，出广海之北，榄糖木之节目结成，状如胶饴而清烈，无俗腐旋气，烟清味平，宛有真馥。”

由此可以看出，榄糖糖在宋代已经广泛用于熏香，但宋人并未将榄糖糖与詹糖糖联系起来，虽然它们都是榄糖糖树脂这一种物质。如《图经本草》中就明确表示：“又有詹糖糖……唐方多用，今亦稀见。”

唐以后詹糖糖的失落，从日本的古代文献中，也可见一斑。

在日本，詹糖糖最早出现在登记法隆寺财帙的《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747年)中，其中登记詹糖糖有46两，这些香料大多用于制作炼香。如日本后世的《薰集类抄》中记录了30个“梅花”方，其中18个都使用了詹糖糖。在日本炼香中，詹糖糖除了作为呈味香料，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粘合剂，通常搭配炼蜜使用。

从来源看，日本所用詹糖糖全部来自大唐的转口贸易。唐朝高僧鉴真在东渡日本时也带了很多詹糖糖。《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磨香甘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麝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斤。”在第五次东渡时，由于遭遇风暴，鉴真一行漂流到海南岛，在岛上他们发现了许多詹糖糖树：“唐唐香树，聚生成林，风

至，香闻五里之外。”

唐亡后，中国人自己都少见詹糖糖香时，日本也就不能得到了。到平安时代后期，詹糖糖很难再买到，这可能就是《薰集类抄》中部分“梅花”方不再使用詹糖糖的原因。田中圭子在《薰集类抄之研究》中指出，室町时代之后的薰物书中记载：“占唐是近年日本へは渡らざる物なり”(近年没有詹糖糖运到日本)，“占唐はむかしはからよりわたり，いまはなし”(詹糖糖自古就有，现在没了)。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詹糖糖“其花亦香，如茉莉花香气”。其运用已十分有限，明末《香乘》中除一段常规的文字描述外，只在春宵百媚香、千金月令熏衣香(宋《陈氏香谱》亦记)两个香方中出现。

而清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詹糖糖”，只能根据古籍描述的文字猜测。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中称：“詹糖糖……今宁都州香树形状正同，俗亦采枝叶为香料，开花如桂，结红实如天竹子而长圆，图以备考。湖南有一种野樟，叶极香，甚相类，夏时结子，稍异。”这段文字没有任何出处，应该是吴其濬首创。

之后《中华本草》沿袭此说，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关于詹糖糖的误解就此传播开来：“詹糖糖，药材基源：为樟科植物香叶子的树皮或叶。拉丁植物名：*Lindera erythrocarpa Makino*。采收和储藏：枝叶采收后，洗净切碎，加水慢火煎熬即成。”

我们可以就此梳理詹糖糖的历史脉络：它在魏晋南北朝时通过佛教和朝贡贸易进入中原，在唐朝大放异彩，甚至成为皇室的供奉用香，同时它也传入了日本，成为贵族炼香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经历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詹糖糖逐渐被人遗忘。不过，怡人的香气比纸面的记载更绕梁，它在宋朝以榄糖糖的名字重新回归。詹糖糖后来又经历了清人的误解，在今天则被重新发现——詹糖糖即榄糖糖，在对法门寺地宫供奉香料的分析中，我们获得了实物的证据。

今天，通过科技手段对古代有机残留物进行分析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法门寺的这项研究即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GC-MS)测定了供奉指骨舍利香料中的成分及其可能来源。日本则在上世纪已经完成正仓院保存药物香料的两次全面调查，至今每年都会发表学术报告，屡屡以最新技术得出推翻旧说的证据。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草药学和药学独树一帜，留下了一套传承有序、体系完整的草药学、香学知识，于今也发现了很多出土实物，但对于疑难、失传原料的还原多依靠文献考证，少有结合规范检测出土香料的研究。这篇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与法门寺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论文可以说为中国传统香学提供了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藉此我们大可展望一下传统香料研究的未来。

